

毛宇宽 音乐文集 ①

世纪安魂曲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毛宇宽
音乐文集^①

世纪安魂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宇宽音乐文集. 上卷, 世纪安魂曲 / 毛宇宽著.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81096-367-1

I. 毛… II. 毛… III. 音乐—文集 IV. 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8355 号

著 者 毛宇宽

责任编辑 俞人豪

封面设计 袁银昌

书 名 毛宇宽音乐文集 上卷 世纪安魂曲

出版发行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鲍家街 43 号

网 址 <http://press.ccom.edu.cn/>

邮 编 100031

发 行 部 010-66418248

传 真 010-66415711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350 千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25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81096-367-1

定 价 180.00 元(上下卷)

敬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电 话 021-58925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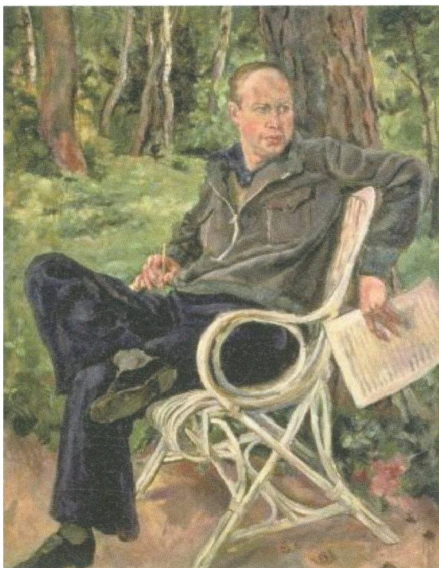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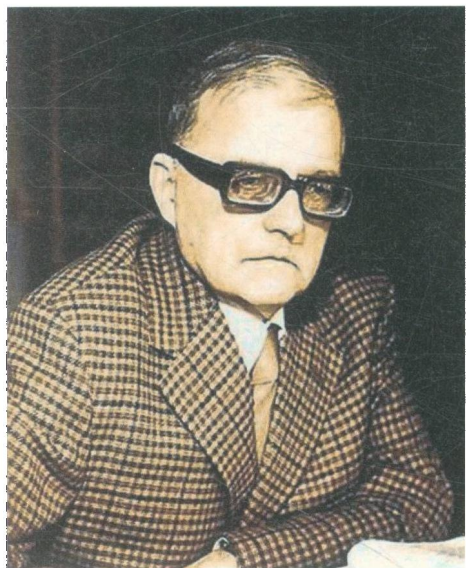
谨以此文集衷心祝贺
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七十华诞





本文集作者莫斯科红场留影（2002）

毛宇宽，音乐学者、翻译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编译室及音乐学系外国音乐史教研室副主任；香港民族音乐学会创会人之一，担任该会理事，并于2004年成为该会荣誉会士。



左图：
肖斯塔科维奇

右图：
普罗科菲耶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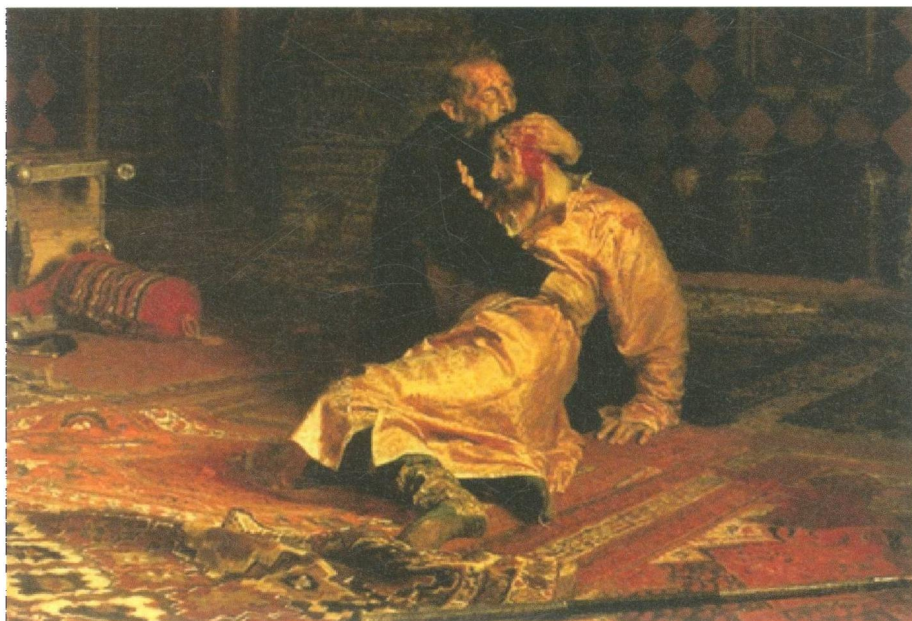
康恰洛夫斯基
油画（1934）



《查波罗什的哥萨克
给土耳其苏丹写信》

列宾 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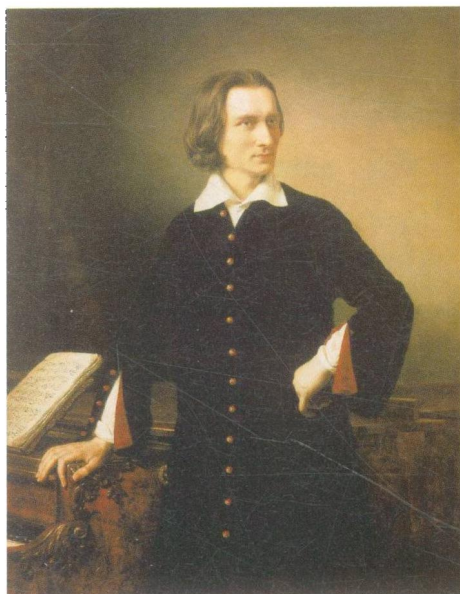
请阅《《死神的歌与
舞》新篇》中肖斯塔
科维奇第14交响曲
的同名乐章



《伊凡杀子》

列宾 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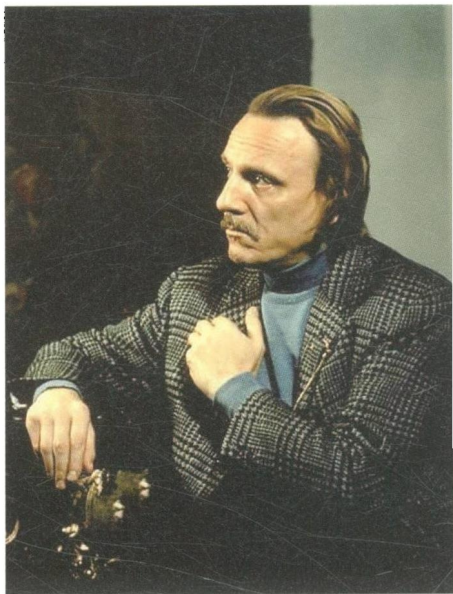
请阅《普罗科菲耶夫
的人生旅程与创作
脉络》
(普氏配乐的电影
《伊凡雷帝》上下集
遭斯大林查禁)



左图：
李斯特

巴拉巴斯
油画（1847）

请阅《西洛蒂话说
恩师李斯特》



右图：
米凯兰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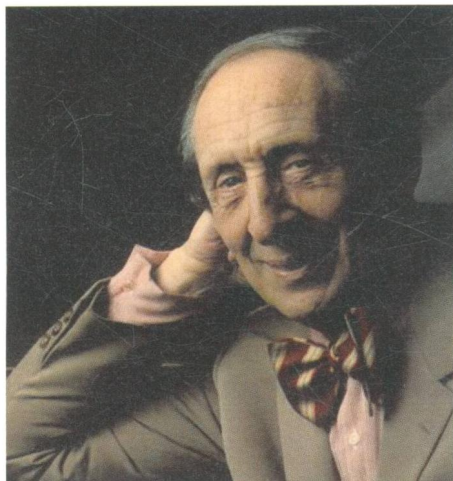
请阅《琴坛怪杰米
凯兰杰里匪夷所思
的一生》



左图：
奥伊斯特拉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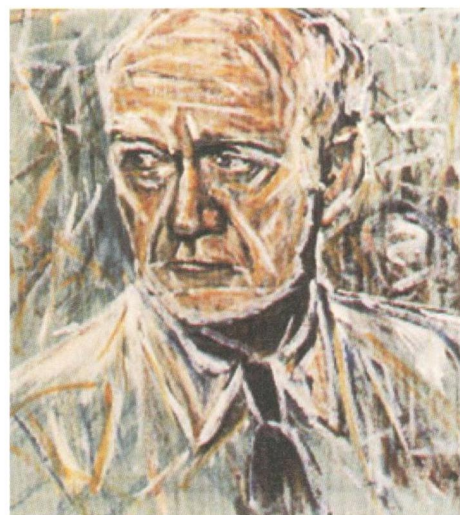
尹戈尔 素描

请阅《与大卫·奥
伊斯特拉赫相处的
日子》及《大卫·奥
伊斯特拉赫自述——〈我的道路〉》



右图：
霍洛维兹

请阅《一代天骄霍
维兹的童年与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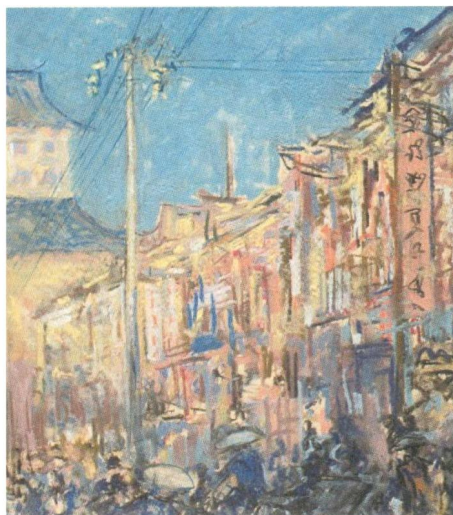


左图：
李赫特

费舍尔-迪斯考
蜡笔画（1982）

右图：
李赫特的画作

请阅《温馨感人 苦
难中更显崇高真
情》及《伟大钢琴
家 辛酸骨肉情》



序

于润洋

此刻放在我书桌上面的，是一部长达六十余万字的音乐著述的电子文本。这是一份年近八旬的长者近三十年来撰写的音乐文稿。

作者毛宇宽先生是一位不仅具有良好的音乐功底和隽永的文采，而且还在俄罗斯语言方面有很高造诣的音乐学者。他早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主要从事苏联音乐的著作翻译和为苏联专家讲学的口译工作，发表和出版过不少很有分量的译著。50年代末，他曾为管弦系开设《弦乐艺术史》课程，在我国填补了这一学科的空白；80年代初，他为文革后首批入学的音乐学系学生讲授了《俄罗斯音乐选粹》课程，力求对历史人物和音乐作品进行新的思考与评价。1982年，毛先生移居香港后专事音乐著述，这部文集就是他三十年来孜孜不倦、潜心工作的成果。特别是后期，在眼力不济、直至近乎失明和完全失明的情况下，仍然不停地坚持写作，殚精竭虑，最终成就了这部弥足珍贵的文集。在当今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学术上急功近利、文风日下、文字垃圾成堆、“娱乐至死”的年代中，这部文集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学术上的严肃、坚韧和敬业精神，委实令人敬佩和感动。

文集中所论，涉及对苏联—俄罗斯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的介绍和研究，也涉及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和音乐批评的论述，以及对一些音乐往事的珍贵回忆。

文集中用力最深、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和最富启迪的部分，是作者对苏联音乐的研究篇章，特别是其中对苏联音乐发展的历史反思，以及对两位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的论述。《血泪凝成的光辉——苏联音乐的历史警示》一文是在1994年香港大学举行的中国音乐美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论文。文中对苏联音乐创作在特定历史土壤上的坎坷经历和辉煌成就，特别是对其惨痛历史教训的论述是深刻而发人深省的。非常可贵的是，作者在叙事中不是历史的冷漠旁观者，而是充满了严肃而又热烈的激情。文集中关于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两篇长篇论文是为中央音乐学院主编的《中国音乐百科全书》撰写的重要条目释文，对苏联的这两位音乐大师的人生旅程和创作脉络做了认真的描述、概括和评价。文集中共收集了有关这两位音乐大师的31篇文章，对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一一做了认真的介绍和解说。以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为例，就囊括

了肖氏的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交响曲，以及声乐套曲《犹太民间诗选》等重要作品。

作者在文集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绍和评论了 19 世纪以来西方音乐历史中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作曲家及其作品。其中特别是关于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等人的篇章，内容丰富，文笔酣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作者还为多种体裁的古典音乐名作撰写了深入浅出的赏析性文章。它们不仅能对普及高雅音乐和提高听众欣赏水平发挥显而易见的作用，而且也将为从事音乐专业的朋友提供一份饶有兴味的读物。

文集中除了主要涉及西方音乐领域之外，特别使我们关注的是还收入了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的篇章。在诸如《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若干问题之浅见》、《音乐批评必须正本清源》等文章中，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研究和音乐批评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极富针对性和论争性，体现了一种可贵的、鲜明的批评精神。《循历史轨迹探音乐创作的民族潮流》一文详细追述了西方音乐创作的历史中民族潮流的演进和发展过程，文章对中国当代的音乐创作很有启示意义。《马思聪创造的音乐瑰宝理当推向世界》一文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马思聪研究文章，作者对马思聪作品的珍爱以及将其作品推向世界的呼吁体现了他身为一位中国音乐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关于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回忆文字是一篇非常感人的文章，极其生动的往日回忆，对吴伯超、廖辅叔等师长的怀念、感恩之情充溢在清新的叙述之中。这篇文章对中国音乐教育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时光飞似地流逝了，但往昔的许多事情和情景在回忆中却仍恍如昨日。当我 50 年代初还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便知道学院内有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洋溢的青年翻译家和学者名叫毛宇宽。60 年代初我从域外回国任教后与宇宽兄相识，至今已经整整 50 年了。三十年前他同夫人一起赴香港定居后，虽然我们之间交往的机会少了，但彼此间断断续续地仍然保持着联系。如今每当我回忆起几次赴港同他们夫妇相聚时那种老友相会的亲近、温馨的情景，都令我难以忘怀。就是在今年秋季，我们再一次在哈尔滨的一次会议上相见，也许因为我们都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老去，更对这次相聚感到格外的亲切和珍惜。

就是在这次相会时，宇宽兄交给了我一张刻有他三十年来撰写的文章的光盘，并邀我为他计划出版的文集作序。宇宽兄是一位极重情谊的人，他的这部文集是题献给使他“永远魂萦梦牵的”，“一生中唯一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建校七十周年的。为老朋友的这部大作付梓之前写一点什么，是我应做的事，于是便

愉快地允诺了，这便是上面这一席话的由来。与其说是一篇“序言”，还不如说是一篇“感言”更恰当。这是因为，除了为它尽了一点向社会推荐这部著作的义务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表达了我拜读宇宽兄的这部著作之后在我内心产生的感触。一个人在失去了视力的耄耋之年，终于将用自己心血凝成的文字呈献给自己的母校、呈现给社会，这是怎样一种坚韧的毅力和令人敬佩的精神境界！宇宽兄所做的这一切也鼓励和鞭策我在有生之年为社会，也为自己的母校，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再多做一些事。这是我拜读这部著作之后发自内心的感言。

预祝文集早日出版问世！

2009年岁末于中央音乐学院

于润洋，中国著名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及院长（1988～1992），亦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以及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于先生在音乐美学和音乐史学等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在他的大量学术专著、译作及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序

王次炤

前不久，郭淑珍老师从香港回京，带给我一封毛宇宽老师的信和一张文集的光盘，并再三叮咛我一定要为他即将出版的文集写一篇序言。毛老师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时音乐学系的老师，后来他全家移居香港，虽然我们很少见面，但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毛老师在我心目中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师长，他的才华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曾经令我们每一位学生敬佩不已。记得在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除的年代，毛老师顶着学术界的“左”倾思潮，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一系列关于苏联20世纪现代音乐的学术讲座。那时候的教学条件远不如现在，毛老师的讲稿都是钢板刻印的，那粗糙发黄但却装订整齐的资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老师的讲课相当传神，对于那时求知欲很旺的学生来说更增添了无穷的乐趣。我们上学时，学生和老师经常有机会在一起开会，记得在全系大会上，毛老师很少发言，但一旦开口，他的讲话总会引起同学们的注意，不入俗套的见解和尖锐透彻的语言，并伴有幽默的学者风范，至今还记忆犹新。

1982年毛老师移居香港后，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直到1995年在香港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才重见他和他的夫人金洁老师。在那次研讨会上，我又一次听到他的学术演讲，内容是对20世纪苏联音乐的反思。苏联音乐的这段历史是一段很难作评价的音乐历史。苏联音乐的成就无疑对欧洲乃至世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它又被当时的意识形态深深笼罩。中国音乐界，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跟随着苏联音乐的发展，并得到许多苏联音乐家的帮助。因而，无论从音乐史学的观点上来说，还是从情感立场上来说，都很难评价这段历史。毛老师的演讲紧紧把握住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实事求是地论证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对这段历史做出了客观的评价并在结语中对世人提出警示：“总之，苏联音乐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发展的。它的光辉成就举世瞩目，它的血泪教训也当为全人类镜鉴。”在听毛老师演讲时，我依然像学生时代那样聚精会神。特别令我感叹的是，毛老师离开学校已多年，又深受眼睛疾病的困扰，但他依然在学术的道路上耕耘，并始终保持着严谨笃实的学风。

又时隔15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建院七十周年之际，毛老师要将他多年来所

写的文章结成文集，以此作为献给母校七十华诞的礼物。他在文集的后记中说道：“从孩提时进入国立音乐院幼年班起，到如今垂垂老矣，我一生只有这唯一的母校。虽然身不在学院已近三十年，但与她的学术联系不曾间断，与师友们的情谊毫不褪色，那是我永远魂萦梦牵的地方……”眷眷深情多么令人感动！更使我备受感动的是，这是毛老师在完全失明的情况下所作的编撰工作。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超常的劳动啊！我想，上帝也还有公正的一面，毛老师虽然失去了眼明，但上帝却赐给他一位最好的妻子——陪伴他四十年的金洁老师。金老师热情而又善良，她对毛老师的一往情深和百般照顾，一直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佳话。当我读完毛老师写的后记时，禁不住感动得流泪，我要对金洁老师深情地说一声：“谢谢！”这本文集同样也凝聚了金洁老师的心血。写到这儿，我眼前油然浮现出一个超常幸福的家庭——毛老师、金老师，还有他们的儿子毛翔宇……

毛老师的这套文集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涉及苏联音乐研究的文章共32篇，这中间又以对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两位作曲家的研究为主。此外还包括对中国音乐的研究、音乐表演艺术的研究以及音乐批评、音乐史话和回忆录等。用毛老师自己的话来说：“这不是一部学术专著，而只是一个杂七杂八的大拼盘，姑且把它叫做另类的杂文集吧。”但我仔细阅读后，认为它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音乐学综合文集。它的学术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史料丰富；第二、选题新颖和观点独特；第三、深入浅出。

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在于有丰富的资料准备，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史料收集的程度往往决定了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正如毛老师所说：“史料翔实乃任何史论著作具可信性、权威性的基础。”通观文集，可以看出毛老师在史料收集上花了很大的工夫，不仅来源十分广泛，而且内容翔实可靠。比如：在评价杜那耶夫斯基的时候，除了引用大量历史背景材料以外，还先后摘引了美国《时代周刊》和苏联《真理报》等报刊的评价，引用了卓别林和斯大林等不同身份的名人语录；同时，还摘录了杜那耶夫斯基写给威特契科娃和女记者拉伊等友人的书信。作者把多方面的历史资料综合为论据，用来加强文章观点的说服力。毛老师的资料工作不仅体现在正文中，而且还体现在大量的注释材料中。许多注释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史料。为了使读者对文章中所涉及的历史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他不惜工夫把它们一一详述。比如：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末乐章主题之一《华沙革命歌》时，作者对此作了详细的注解，并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这首歌曲的来龙去脉，读了以后的确令人感动。又如：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三交响曲的歌词中出现的被害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时，作者又在注释中详述了这位在西方为人熟知而在我国却鲜为人知的犹太少女的悲惨身世和对后代的影

响。这些注释不仅能使读者加深对正文的理解，而且还能使读者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文集的资料功底不仅体现在文字上，还体现在丰富多彩的图片上。在某种意义上，图片也是学术资料，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画面，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视觉依据。它们对文集所起到的知识效果和学术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集中，有些史料看似平常，但它的发现会改变我们对历史或历史人物的评价。比如：作者在《马思聪创造的音乐瑰宝理当推向世界》一文中，提到他亲耳所闻的关于卓明理先生评价马先生的一段话。说的是当年卓先生跟随马先生学小提琴，因贫穷交不起学费，马先生就把自己的钱塞给卓先生，要他把钱交给马太太，以解除马太太的不悦之情。这看似小事，但正如毛老师所说：“这是我偶尔得到的一个小小史料，但却凸显出一个伟大的人格，一个令人崇敬的一代师表，为马思聪的传记增添了光彩照人的一笔。”再如：文集中还向读者介绍了一位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外国音乐家——阿甫沙洛莫夫。这位俄裔音乐家看似不知名，但却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他熟悉和热爱中国传统音乐，1918年来到中国，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历时三十年。“他创作的作品全部采用中国题材，依循中国风格。”阿甫沙洛莫夫对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关于这位作曲家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应该载入史册。总之，历史资料的丰富性，无疑给这本文集增添了无穷的学术光彩。

这本文集的学术性还体现在选题的新颖性和观点的鲜明性上。文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的选题与众不同。当然，这主要是出于毛老师在不同时期对音乐问题和音乐现象产生的特定感受；但这些新颖的选题，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说明了毛老师善于从新的角度和用新的方法观察和研究学术问题，由此带给人们新的思考。比如：应香港民族音乐学会之约而写的《循历史轨迹探音乐创作的民族潮流》一文，原本应是一篇理论阐述性的文章。但作者选择了一个新的论述角度和新的研究方法，以民族乐派发展的历史轨迹为线索，通过历史性的描述来探索关于音乐创作的民族性问题。从学术类型上来说，这是一篇史论结合的论文；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它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

文集中，有一篇写得特别令我感动，这就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若干问题之浅见》。这是一篇发言稿，是对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以下简称《史论》）的评论。之所以令我感动的是，数年前我也曾粗读过这本书，也有一些意见。但毛老师却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肯定该作，并如此认真地对它做出评价。尤其是，他

在双目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借助电子放大器把字放得老大，慢慢啃完了两巨册”。毛老师针对书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对作者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他通过实例指出《史论》对待抗日歌曲的偏颇态度，基于主观好恶对历史人物的背离事实的褒贬评价，对政治性音乐作品不分青红皂白的笼统否定等等。毛老师对全书的史料做了十分认真的考据与核实，并对书中的许多观点提出纠正性的意见，最后又列出一张长长的史料勘误表……如此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开阔大度的学者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这也正是贯穿在这本文集中的学术品格。

除此之外，这本文集中还涉及对苏联音乐的评价和对肖斯塔科维奇与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评价的文章，都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和善于表达鲜明学术观点的能力。

最后，这本文集的学术性还体现在深入浅出的表述上。学术界往往把“深入浅出”视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这应该是一个学术常理。毛老师文集中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即使是理论性很强的专论，从无刻意提升理论高度，更无晦涩难解之处；而是寓述于论，寄论于史，用清晰而动人的语言把大量活生生的事例展现给人们，用简洁而形象的表达把深刻的道理交心于读者。这种文风和语性在毛老师的两类文章中都体现得非常充分。一类是理论性的长文，另一类是随感性的短文。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后一类文章，这类文章主要集中在文集的下卷。毛老师用“乐苑史话”、“姑妄言之”、“余音绕梁”和“抚今追昔”来概括四个方面的随感。假如我们细细地去品味这些文章的话，这每一篇看似浅显的短小文章都包含了深刻的学术道理。比如：《永生永世的知音和知心》写的是舒曼与克拉拉的爱情故事，作者用副标题“爱的酸甜苦辣造就了艺术的至真至美”来暗示爱情故事背后的艺术真谛。这篇史话性质的文章实际上也是在表达作曲家的一种创作心理。心理学家马克斯·格拉夫曾经把“性爱”看作是作曲家从事音乐创作时重要的内在体验，这篇文章也正是在验证这种特殊的作曲心理。再如：《言外之意蕴含音乐中》写的是穆索尔斯基的音乐介绍，作者选用了管弦乐《荒山之夜》、歌剧《霍万斯基之乱》的乐队序引《莫斯科河上的黎明》以及艺术歌曲《跳蚤之歌》三部作品。毛老师写这篇文章的意图非常明确，即通过对这三部作品中所蕴含的意义之解析，来说明一种创作思想的重要性。这也是穆索尔斯基所崇尚的、并一直影响着苏俄音乐创作的艺术思想，即如同作曲家自己所说：“艺术家不可能逃避外在世界，即使主观色彩很强的创作，也反映了外在世界的印象。”这里我还要举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为例，一篇是《新发现和老问题 莫扎特究竟写了多少交响曲》。这看起来好像是为儿童而写的趣味性文章，但假如仔细想想，在我们中间究竟有多少人明了这个老问题？也许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但我认为

这既是一份历史知识，也是一份重要的史学资料，需要有这种“新发现”。还有一篇是收集在上卷中的《它是“语录歌”的开山鼻祖吗普罗科菲耶夫的康塔塔〈献给十月革命20周年〉》。我之所以认为这篇短文意义深刻，不仅是因为它为我们研究“文革”时期的语录歌提供了历史参考，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讲历史故事的形式，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难道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所创造的许许多多艺术瑰宝都要由于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牵累而统统扫入垃圾堆吗？是否人类的文明就该是这么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演化过程，必须经过漫长岁月，再由后代子孙去寻宝、去重新发现和挖掘？难道历史就要这么作弄人！？”

写到这里，突然发现我的这篇序写得太长了，也许是因为有感而发，想要说的话真的还很多……姑且用毛老师在最后一篇文章《访欧柏林音乐学院散记》中的结语结束这篇序言，文中写道：“我希望这篇文字不仅能够让朋友们有兴趣读得下去，而且能引起一些思索。”这一定不只是指这篇文章，而是指这本文集吧。序言应该写完了，但我还有个希望，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希望有一天毛老师的眼睛突然复明，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央音乐学院每一位教职员工、学生和校友的希望啊！

2010年8月18日于北京

王次炤，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院长。先后在该院开设七门音乐学各类课程，出版音乐学著作和教材多种，发表论文和各类音乐学文章百余篇。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兼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全国艺术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评论学会会长及《人民音乐》主编等职。

序

刘靖之

与毛宇宽先生相识于1984年5月1日，那是香港民族音乐学会成立的日子，至今已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通过学会会务工作、论文集的编辑事务而有所接触、了解，成为好朋友。毛先生的儿子翔宇是位杰出的钢琴演奏家、出色的钢琴教师，现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因此我们是同事。毛夫人金洁女士，在钢琴教学之余也经常参加香港民族音乐学会的会务和学术活动。由此可见，毛先生和他的家人与我是颇有缘分的。

香港的音乐界，一向具有重欧轻中、重演艺轻研究的传统，这种现象在音乐学术圈里感受特别深刻。毛宇宽先生从北京移居香港，并积极参与香港民族音乐学会的学术活动，实在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之失、香港民族音乐学会之得。从另一个不分彼此的角度来看，毛先生在音乐史学上的贡献是属于整个中国的。

从事任何研究课题，相应的工具是极为重要的，如要研究贝多芬，不精通德文和德国文化就难以成事，经过译文来研究只能算是先天不足的贝多芬专家。毛先生曾担任俄文音乐论著的笔译和为苏联音乐学者来华讲学的口译员，为他从事苏联音乐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香港，毛先生所掌握的俄文与俄罗斯音乐文化这个“工具”是鲜有的。

毛先生的强项还在于他的“诚”——诚实、诚意、诚心、诚挚。在两本文集里，篇篇都显示出他“诚”的素质，篇幅越大论述越深刻的文章，就更能体现出这种“诚”。我们从文章的题目便能感觉到他强烈的感情：《血泪凝成的光辉——苏联音乐的历史警示》、《历史的悲剧 人生的悲剧》、《意境深邃 意味深长》等。毛先生的这种“诚”，不仅令读者产生共鸣，还为其他的音乐学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目前，人们心浮气躁，为名为利而不择手段来钻营，正需要毛先生的这种文风。“诚”是对事不对人的，是需要有勇气的，对这一点我有切身的体会。毛先生论文集上卷中《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若干问题之浅见 附：黄霑先生致笔者的一封信》，其初稿原是他1999年在为拙著《中国新音乐史论》一书召开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毛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些批评，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这绝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事实上，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已分成了“大陆”、“台湾”、“港澳”三大块，加上海外的华人社区，

“中国”这个名词的内涵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已大不相同了。在金融、经济、工业、科技上可能更趋向全球化，但在文化、意识形态上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磨合起来。黄霑博士致毛先生的信也说明了这一点。

毛先生论文集里的有关俄罗斯作曲家的论述都是颇有气势的大块文章，涉及俄罗斯乐派在音乐历史里的一个特殊而重要时期。自从19世纪末俄罗斯民族乐派异军突起之后，一直是欧洲音乐的一股重要力量，推动着欧洲音乐发展，20世纪30~50年代虽然受到政治压力，但仍然显示出强烈的生命力，其中肖斯塔科维奇是重要的代表人物。毛先生的选题极具慧眼，有关肖斯塔科维奇的共17篇，有关普罗科菲耶夫的14篇，而这两位作曲家是20世纪作曲家中之佼佼者，《血泪凝成的光辉——苏联音乐的历史警示》一文既赞扬了苏联音乐的光辉成就，也叙述了这种成就的血泪教训。他对极权统治下的苏联竟能产生令举世叹服的伟大音乐家和伟大作品所进行的辩证历史分析，在有关中国20世纪音乐史的论著里似乎还没有见到。

毛宇宽先生论文集里总共收入了86篇文章，其中的部分属于乐评一类。音乐批评无论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都是较弱的一环。两岸四地的演出、作曲一向是热热闹闹的，而理论、音乐学、音乐史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音乐批评却冷冷清清，音乐批评往往变成了音乐报道、相互捧场或政治打压的工具。毛先生的《音乐批评必须正本清源》一文从各个方面对1949~1976年大陆的音乐批评状况进行反思和讨论，是一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好文章。

两大卷《毛宇宽音乐文集》的出版对中国音乐的学术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其意义在于论文集不仅理性、客观、清晰地研究、分析、评论了20世纪下半叶苏联重要的作曲家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梳理了这个领域苏联对中国的深远影响，还在音乐批评方面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思考。我深信毛先生的论文集将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宝贵参考资料和教材，滋养年青一代的学术成长。

2010年8月10日于香港

刘靖之，音乐学家、香港大学人文及社会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香港民族音乐学会首任会长（1984~2004）、香港翻译家协会会长、上海音乐学院外聘专任教授，亦曾任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及德国海德堡大学访问学者。刘氏在音乐、文学和翻译等领域的研究体现了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精神。已出版著、编之学术著作达四十余部。